

清代“新”边塞词及其文化内涵摭论

许 博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清代边塞词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清代边塞词中有很多与传统的边塞文学迥然不同的“新”作品,尤其是女性边塞词、流人边塞词和遗民边塞词这三种“新”边塞词格外值得关注,所谓的“新”边塞词说到底就是清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新的边塞词,反过来它们又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历史时代。这些“新”边塞词为历史悠久的古代边塞文学注入了一股新意,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清代边塞词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清代;边塞词;女性;流人;遗民

[中图分类号]I207.2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6)05-0135-06

清词在各种题材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清代边塞词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何尊沛先生的《试论清代边塞词》^{[1]66-72}一文曾对整个清代边塞词做了一番梳理,按时间顺序点到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颇具开创之功,但尚有很多重要问题未曾论及。笔者通过对清代边塞词的整理,认为清代边塞词中有很多与传统的边塞词乃至边塞诗^①迥然不同的“新”作品,这些“新”边塞词为历史悠久的古代边塞文学注入了一股新意,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清代边塞词的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女性边塞词、流人边塞词和遗民边塞词这三种“新”边塞词格外值得关注,本文主要对此三类作品进行论述。

一、红粉才媛的戎装梦——清代女性边塞词

从古代边塞文学产生起,边塞文学的作者几乎被男性垄断,唐代是边塞诗最辉煌的时期,但也极少见女性边塞诗人的身影。戎马倥偬、塞草黄沙似乎注定与女性缘浅^②。这种现象不难理解:一方面,古代内地女性由于各种限制,很少能够身临边塞,而闺中女子变做“雄音”也会被男权社会视为不适宜;另一方面,从文学兴趣和创作风格角度来看,古代女性作家对边塞诗词也相对隔膜,陶秋英先生早就指出:“一般人,女子的作品,总是纤丽精巧而很少雄厚浑朴的……甚至于她们写诗词大都……能写成对偶很工的律诗绝诗,音节幽美的《调笑令》、《如梦令》、《声声慢》等;而不能写一首气概磅礴的古风,或如苏东坡《大江东去》辛弃疾《八声甘州》的慷慨激昂的声调悲壮的词。”^{[2]61}但是,上述现象在清代却渐渐发生了改变。从晚明一直到清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新的启蒙思潮涌现,社会环境对女性的限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异端”思想家李贽首创招收女弟子,清代的众多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如毛奇龄、王士禛、纪昀、袁枚、毕沅、陈文述、俞正燮等或公开招收女弟子,或批

[收稿日期]2015-09-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边塞词与边海疆文化研究”(12ZWC015)、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SJD750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KCX20130044)、东南大学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科研扶持项目”(2242015S20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博(1983—),男,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词学。

①由于古代边塞诗和边塞词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的主体,因此在本文中,古代边塞文学即古代边塞诗词之意。

②旧说建安女诗人蔡文姬有《胡笳十八拍》,但学术界已经判定是伪作。唐诗中有极为少量的女性边塞诗,如鲍君徽的《关山月》,描写了边塞景物和战事,然本事不详,且并无材料显示该女子有过身赴边塞的经历,极有可能是凭借想象的创作;裴羽仙的《哭夫》、陈玉兰的《寄夫》二诗虽于边塞有涉,但都是写妻子在内地思念征人丈夫,不是十分典型的边塞诗,且后者还有可能仅是替征人思妇“代言”,唐代的女性边塞诗影响极其有限。此外,明朝时朝鲜女诗人许景樊有用汉语写就的边塞诗,然毕竟非中国文学。

判社会环境对女性的不公,就连冯梦龙、蒲松龄、曹雪芹等小说家也在各自的小说作品中明确表达对女性的褒赞,正如张宏生先生在总结清代妇女词繁荣的原因时指出的那样:“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女子创作提供了鼓励而不是遏制。有清一代,封建统治虽然在不断强化,但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女性文学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同情。”^{[3]182-183}因此,清代女作家的创作环境相对自由,各种题材均可涉猎,且能够经常得到由男性组成的主流文学界的认同甚至赞赏,在这种背景下,清代女性作家有着非常自觉地向男性的兴趣靠拢的倾向。胡明先生曾指出:“叶氏三女、蕉园五子、随园诸妹、‘松陵’、‘清溪’,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女性发下誓愿,立定志气,努力学习男人文学坛砧正统的诗文辞赋,亦步亦趋,追踪她们理解的文学正统(从内容情志到气象格调),刻意把自己的精神面貌弄得与男人的感情世界一模一样……以求文化心理上的满足,以求传统艺文权威界的承认。”^{[4]87}此论虽稍有绝对化之嫌,但点中了要害,清代女作家确实有着与前代女性不同的追求和抱负,美国汉学家曼素恩就说过:“在中国历史的这段独具风貌的时期里(指十八世纪前后,大体相当于清代——引者注),有教养的妇女作家已开始把她们看做是身处的大时代的象征。”^{[5]25}综上,清代出现女性边塞词便可以理解了。

清代第一位女性边塞词的作者是著名诗人屈大均的发妻王华姜(1645—1670),华姜系明末“九边”之一陕北榆林镇守将王壮猷之女,“好驰马习射,诗画琴棋,无所不善。伉俪甚笃。”^{[6]107},惜乎以小产中风而卒。她有一首边塞词《八声甘州·闻歌》:“边人歌听去更伤悲,他人闻也哀。是凄凉时候,风沙异境,万里传来。何必琵琶催拍,调出蔡姬才。但习边庭苦,总惯低回。最怕寒宵孤馆,正旅愁不奈,排遣难开。恰梅花闻落,疑上望乡台。却无心、听他曲罢,且倚床、对烛意全灰。关山雪、此时到也,一样成堆。”^{[7]5692}这首词写在边塞上听到“边人”奏曲唱歌而引发的强烈的旅愁,尤其是下阕“最怕”、“不奈”、“排遣难开”、“疑”、“无心”、“意全灰”等一连串心理描写千回百折、层层递进,堪称精彩。作为清代第一首女性边塞词,华姜的这首词一直没有受到清词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实属遗珠之憾。此外,清代还有从未踏足过边塞却凭借想象“拟作”边塞词的才媛,康熙时期“蕉园五子”之一的柴静仪(生卒年不详)便是典型代表,她有一首《风入松·拟塞上词》:“少年何事远从军,马首日初曛。关山隔断家乡路,回首处,但见黄云。带月一行哀雁,乘风万里飞尘。茫茫塞草不知春,画角那堪闻。金闺总是书难寄,又何用、归梦频频。几曲琵琶送酒,沙场自有红裙。”^{[7]2989}柴静仪现象在清代绝不是个例,略晚于柴静仪,同样是终身未曾身临边塞的著名女词人熊琏(1758—?)也有数首边塞词创作,如《望江南》:“关塞月,老将梦魂凄。绝域经年添白发,清辉彻夜冷征衣。帐外马频嘶。”^{[7]2338-2339}寥寥数语足为边关老将画像。一生远离边塞的江南才女,为什么要作“拟塞上词”?恐怕还是因为要自比男性,追求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满足,这其实是一种文学性别取向的“异化”,这种“异化”可以被看做是清代女性在文学上追求“自强”的一种表现。同时,这种现象也与当时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清代女性热烈渴望像男性英雄一样建功立业的“时尚”潮流——有很大关系。与熊琏大体同时的女作家王筠(1749—1819)便以“身列巾帼为恨”^{[8]234},她有一首《鹧鸪天》词自表心声:“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8]234}她的“壮志”和“心情”是像班超那样建立功业,并以未能像木兰那样征战沙场为憾,词中班超、木兰两典都与边塞和军旅有关,可见这位才媛的热血和雄心。无独有偶,比王筠晚半个世纪的著名女词人吴藻(1799—1862),亦“以身为女子而抱恨”^{[9]603},曾自绘《饮酒读骚图》,将自己画成身着男装、饮酒读骚的女子,又绘《速变男儿图》,画的是崇嘏女扮男装、在幕府里担任参军的故事,这显然说明词人对此无比向往,竟与王筠的“木兰崇嘏事无缘”如此不谋而合。吴藻的词中也多有与边塞军旅戎马相关的热血词句,如《水调歌头·孙子勤〈看剑引杯图〉,云林姊属题》云:“长剑倚天外,白眼举觞空。莲花千朵出匣,珠滴小槽红。浇尽层层块垒,露尽森森芒角,云梦荡吾胸。春水变醅醑,秋水淬芙蓉。饮如鲸,诗如虎,气如虹。狂歌斫地,恨不移向酒泉封。百炼钢难绕指,百瓮香频到口,百尺卧元龙。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10]也是恨不能手挥长剑,气吞万里,封侯酒泉郡。著名女词人左锡璇更是在词中直言自己“欲借吴钩三尺,扫净边尘万里,巾帼事征鞍”(《水调歌

头·小除夕》》^[11],这些显然是红粉才媛心里的“武功”情结。

这种现象到晚清就更加突出了,晚清数十年国运多艰,孱弱的中国屡遭外敌欺凌,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到了边塞词创作的行列,只是由于晚清御侮的重点转向海疆,边塞词的重心在相当程度上移到了海疆。如道光年间,被誉为“巾帼英雄异俗流”著名女词人沈善宝(1808—1862),在鸦片战争期间闻知英军由海上进攻长江口(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后,与女词人张孟缙合填了一首《念奴娇》,善宝《名媛诗话》云:“壬寅荷花生日(阴历六月六日——引者注)……时孟缙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痍成患,相对扼腕。出其近作《念奴娇》半阙,云后半未成,属余足之。余即续就。”^[12]善宝所填之下阙云:“闻说照海妖氛,沿江毒雾,战舰横瓜步。铜炮铁轮虽猛捷,岂少水犀强弩。壮士冲冠,书生投笔,谈笑擒夷虏。妙高台畔,蛾眉曾佐神武。”^[12]词填得雄放杰出,英武逼人,歇拍用的是著名女将梁红玉在镇江金山妙高台擂鼓助战之典,表达了渴望为国出力“平夷虏”之壮志,连孟缙都认为沈善宝的词句“雄壮不减坡仙”^①。除沈善宝外,薛绍徽等晚清女词人也有非常精彩的边塞词(海疆词)传世。有了清代二百多年的女性边塞词,清季诞生出高唱“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的豪侠女词人秋瑾也就不令人觉得突兀了,清代女性边塞词就是鉴湖女侠慷慨雄音的先声(尽管秋瑾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边塞词传世)。

二、“犯人”们的苍凉心曲——清代流人边塞词

所谓“流人”,就是“犯法”后被流放塞外的“罪犯”,他们无疑是文学创作者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当然,古代封建社会对“犯法”的界定与今日迥异,更何况古代社会法制很不完善,冤假错案多,所谓的“罪”很多都是莫须有的,因此,古代有不少流人是优秀的仁人贤士。在清代,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就是将尚不够死刑的重犯流放至边远荒凉之地,具体地点则如《清史稿·刑法志》所云:“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乾隆年间,新疆开辟,例又有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为奴种地者。”^{[13]4195}流人们在边地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多有不能生还内地者。将“流人”流至北方边地的刑罚至少从秦代便已出现,秦后,该刑罚被视为“严刑峻法”和“暴政”,各王朝减少了对这种徒刑的使用,到了明代,奉行重典政策,这种刑罚又得到大幅强化,但是在清代以前,流放边地的“犯人”中几乎没有文学家这一精英群体(古代的官员贬谪不属于“犯人”流放的范畴),因此清代以前的边塞文学作品也几乎未见出自“流人”之手的。到了清代,满洲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震慑打击汉族知识分子,屡兴大案,如清初的“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等,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众多文字狱,这些案狱均株连甚广(仅著名文士吴兆骞被卷入的顺治十年的科场案受株连者就达一千多人),大批无辜的文士被流放边地,他们中的一些词人在流放地创作出一批边塞词,是为流人边塞词,清代流人边塞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清代最著名的流人边塞词作者当属吴兆骞,兆骞坐顺治十四年(1657)南闈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该地在京师东北2500里处,流放该地的人很难生还内地。兆骞有一首《百字令·家信至有感》写他在宁古塔收到妻子家书后的种种感受:“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楼。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据。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角,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7]5986}这首词极其情真意切,将一个塞外流人的艰难处境和对患难之妻的感情真实地表达了出来。再如《生查子·古意》:“秋高紫塞风,阵阵衔芦雁。盼断别时音,尘暗书难见。昨岁灞桥头,折柳看如线。又是玉关春,絮卷天涯远。”^{[7]5986}这首词正如严迪昌先生指出的那样:“题作‘古意’,实系‘今情’,只不过略加掩饰罢了”^{[9]150}。吴兆骞在宁古塔流放时间长达23年之久,经挚友顾贞观求助于纳兰性德,才得以生入山海关。吴兆骞是当时的江南名士,他被流放宁古塔是一

①沈善宝云:“余即续成,孟缙笑曰:‘卿词雄壮不减坡仙。’”《名媛诗话》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件在文人圈中影响很大的事,在当时和后世有不少人围绕吴兆骞流放塞外之事填写的词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顾贞观以词代书的《金缕曲》二首,这些以吴兆骞流放塞外之事为母题的词作数量众多,这些词也可纳入流人边塞词的范畴,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除吴兆骞外,因“罪”流放塞外的著名词人还有“西泠十子”之一的丁澎(1622—1686),丁澎于顺治十五年(1658)因河南科场案流放关外尚阳堡,直至康熙二年(1663)赦回。丁澎边塞词的代表作是《贺新郎·塞上》:“苦塞霜威冽。正穷秋、金风万里,宝刀吹折。古戍黄沙迷断碛,醉卧海天空阔。况暮幕、又添明月。榆历历兮云槭槭,只今宵、便老沙场客。搔首处,鬓如结。羊裘坐冷千山雪。射雕儿、红翎欲堕,马蹄初热。斜弹紫貂双纤手,搯罢银箏凄绝。弹不尽、英雄泪血。莽莽晴天方过雁,漫掀髯、又见冰花裂。浑河水,助悲咽。”^{[7]3191}这首词是清词当中的一篇名作,严迪昌先生盛赞此词“颇多认识价值,写得也苍凉浑厚而情致流畅,不可多得”^{[9]26}。开篇“苦塞”两个字就为全篇定下基调,全词通过对深秋塞外种种的特有意象的勾勒,将流人内心的悲苦、无助乃至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清初文士李蕃(1622—1694)于康熙十八年因“刑案失律”得罪,流放辽西,曾填一首《满江红·榆关寄内》:“寄来寒衣,件件自、芜湖城畔。正值新霜满地,西风如箭。多是线针因泪湿,暗添酸楚伤心换。想人生、富贵总无常,思量遍。榕叶赋,蒸羊饭。霜风急,须眉健。半世功名吾舌在,百年杖履卿身见。好安排、几部未残书,归来看。”^{[7]3221-3222}这首词是李蕃收到妻子寄来的寒衣后从山海关寄给妻子的,在以往的边塞诗词里都是写妻子给丈夫寄寒衣,而这首词则是丈夫收到妻子寄来的寒衣后的抒感,是一个独特的新角度。“蒸羊饭”、“须眉健”云云实为“报喜不报忧”,而事实上,一个南方人(李蕃系四川通江人)在寒冷荒凉的塞外的生活状态是不难想像的,而这样写就更显出了一位流人对妻子深挚的感情,该词下片表面看很是洒脱,细品则是非常感人的。再如江苏泰兴籍文人季开生(1627—1659),于顺治十二年(1655)因事流放尚阳堡,在塞外与剩人和尚函可、郝浴等名流有交往,对关外地区文化进步做出很大贡献,惜乎被流放地的流氓打死,季开生的流人边塞词代表作有《番女怨·秋日即事》二首^{[7]4978},描绘了塞外的秋景,以及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慨和思念南方故园的心绪。

蒙冤获“罪”、流放塞外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人生悲剧。清代流人边塞词是将“犯人”们的人生不幸和凄凉心曲注入边塞词中,皆为发自心底的呼喊,极其真挚感人,正所谓“以血书者”^①。流人边塞词不但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是后世了解清代流人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统治者给文人知识分子造成的创痛,它们是清代边塞词中的珍品,值得重视。

三、故国之思与无限边愁的交集——清初遗民边塞词

清朝初年的边塞词出现一种新情况——部分边塞词的作者是明朝的遗民,他们的边塞词中包含着浓烈的故国之思,这是边塞词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边塞题材在词这种文体中出现很早,边塞词早在唐五代时就已经产生,甚至还相当常见。词牌的名字亦有取自边塞内容的,如“甘州”、“沙塞子”等,这显然与胡乐是燕乐的一大源头有关,据刘尊明先生统计,唐五代时以边塞内容命名的词调有48种之多^{[14]70-71}。此后从两宋到金元明,边塞词亦是代有其作。从主题角度来看,清代以前的文人边塞词,最为多见的主题就是边愁和思乡,其它主题的边塞词也会出现,如边地景物、边地战争、边塞怀古等等(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伴随着边地多事,边塞词的主题变得丰富起来)。但是,在边塞词中抒发遗民情愫或故国之思是词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有之,则始于清初之边塞词。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士夫素来即有不事二朝的情结,每逢朝代更迭之际,往往就会产生一批遗民(尤其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段,即理学盛行的宋之后,遗民现象就更为显著)。诗言志,在文学史上,每逢朝代更迭之后就会产生一批表现遗民情结的文学作品。词作为一种产生较晚的抒情文学,兴起于唐五代,盛于宋,而与此同时,五代、十国直至两宋、辽、金,又是中国历史上易代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然而考察从唐五代直到金、南宋灭亡之前的所有词作,很难找到抒写故国之思的作品。这是因为在唐五代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43页。

两宋,词主要还是在歌场宴会上用来演唱的歌词,最常见的主题是花前月下、伤春惜别一类,文人很少将故国之思这样“重大”的感情用词来表现的。然而到了金和南宋相继灭亡之后,情况反转,无论是北方的金朝遗民还是南方的宋朝遗民,都在词中抒写故国之思。尤其是南宋词人如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甚至还出现了《乐府补题》这样的遗民词总集。从题材角度看,元初遗民词人的故国之思主要是通过咏物词等题材来表现的,元明两代尚未见将边塞词与故国之思结合起来的,有之,亦始于清初之边塞词。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边塞词中抒写遗民情思是清初词坛产生的一个新现象,故国之思和无限边愁于此有了交集。

清初创作遗民边塞词的词人有屈大均、朱彝尊、蒋平阶、释今无等,其中朱彝尊在康熙十七年(时已50岁)应召入都参加博学鸿儒科会试之前尚为遗民身份,曾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50岁以后才入仕清朝,但朱氏的边塞词全部创作于他做遗民之时,因此本文将朱氏的边塞词视为遗民边塞词。遗民边塞词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屈大均,屈大均是异常坚定的明遗民,一生致力于复明的“大业”,曾两度远赴塞上从事反清活动,尤其是第二次,从康熙五年(1666)开始,屈大均以边城大同为中心,在今晋、陕、冀长城沿线地区活动两年时间,创作多首含有故国之思的边塞词。如《昭君怨》(春恨天山难道)^{[15]1261}抒发词人“一心向汉”的怀抱,《百字令》(谁家烟火)^{[15]1257}和《一痕沙》(一向汉儿高卧)^{[15]1264}二词以边塞怀古的形式借题发挥,表达了中原王朝覆亡的哀痛(此前的康熙三年八月,中国大陆上最后一支反清复明的力量——“夔东十三家”遭清军围攻彻底失败,标志着从此“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16]365},屈大均的相关词作或有感于此)。《意难忘·自宣府将出塞作》^{[15]1265-1266}写出了词人渴望击胡塞上却没有机会实现的悲慨,《渔家傲·观边女调神》^{[15]1267}虽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但也写出了汉族的民族自豪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意义的。总之,都是抒发遗民情怀。难怪屈大均同乡后学、近代词人潘飞声论大均边塞词云:“剩水残山郁作诗,塞门骚屑又填词。秣陵吊古苍凉甚,可有金笳故国思。”^{[17]368}著名词人朱彝尊,出身故明世家,其曾祖系晚明“忠著三朝、清风百世”的文恪公朱国祚,受此影响彝尊的遗民倾向非常强烈。彝尊早年曾直接从事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北出塞上,于康熙三年(1664)赴大同投曹溶幕府,于边塞地区活动数年,其边塞词全部作于这一时期,如《百字令·度居庸关》^{[7]5258}等。云间词派名家蒋平阶(1616—约1714),明诸生,陈子龙门生,几社成员。清军南下后投南明隆武政权任御史,隆武政权灭亡后云游四方,以遗民终老。其词中多有边塞之作,尤其是《虞美人·感旧》^{[7]3496}颇为著名,是一首经典的遗民边塞词。此外,广州海幢寺僧释今无(1633—1681)奉其师函可之名出关寻找被流放辽阳的师伯“剩人和尚”函可^①,有《满庭芳·出山海关》^{[7]5693},词中誓言要学习苏武“啮雪驱羊”、心向大汉的“节烈”,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也不动摇,这显然是一种心念故国的坚定意志。

上述边塞词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边塞词中表现遗民之思,使遗民之思与无限边愁自然地融和在一起,相互激荡,互相衬托,倍增了“思”和“愁”的效果,为千年边塞词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清初边塞词中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明朝之亡,很大程度上是事出边塞,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清分别起于西北和东北边塞。西北方面,长期以来,明朝在西北边塞要地一直驻有大量边防军,明末天启崇祯间,西北边塞“兵卒经常得不到兵饷……缺饷的兵卒无以为生,因之相率逃亡及聚众叛变的事层出不穷。这些叛兵逃卒……在饥民发动起义之后,也便纷纷相从起义,甚至成为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18]208}李自成、张献忠都是由明朝西北边防军人转变为农民起义领导人的。而明朝最终京师失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城沿线一系列“苦心经营”的险关要塞,由于人心已散,在李自成的进攻面前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东北方面,满清(包括后金)势力数十年间不断从塞外打击和侵扰明朝,使明朝元气受损,后大举入关,奄有中原。明朝亡于边塞和满清兴于边塞的事实,使遗民之思与边塞词在清初遗民词人笔下相互结合起来,这就是清初遗民边塞词产生的原因。

①函可(1612—1660),广东博罗人,本明末广东僧人,因所著《再变纪》等有“违碍”清廷之处,被流放辽东。

四、余论: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新”边塞词

清代产生如此之多前所未有的“新”边塞词,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上述三类“新”边塞词,表面看似各自独立,但它们有着重要的共同因素。它们无一不是清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社会大环境的宽松化和女性追求“自强”的时代风气成就了清代女性边塞词,大批文人词客沦为“犯人”被流放塞外催生了清代流人边塞词,明朝亡于边塞和满清兴于边塞的事实促成了清代遗民边塞词。三类“新”边塞词本身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可以从很多侧面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这一点远远超出清代以前的边塞词。另一方面,这些“新”边塞词又大大地丰富了古代边塞文学的内容。一般来讲,清代以前的边塞诗词,虽然历史悠久、数量庞大,但主题内容几乎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相对积极的报国杀敌和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则是战争残酷、边塞艰苦和思乡盼归,可以说边塞诗词的主题内容略显单调,变化不多。清代“新”边塞词的大量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巾帼群体的自强意识、知识分子的生命呼喊、孤臣遗民的故国之思都在边塞词中“集中展示”,这显然为传统的边塞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塞文学的面貌,是传统边塞文学在清代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表现。仅就边塞词而言,清代“新”边塞词对中国边塞词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就更为明显了,应该承认,清代以前的边塞词虽亦有佳作,但是思想深刻、主题新颖、文化内涵丰富、体现时代特色、令读者过目难忘的边塞词作品并不多,边塞词在整个词史中的影响非常小,地位不高,清代“新”边塞词则在上述诸方面均达得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提升了边塞词的质量和品位,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这就扩大了边塞词的影响,由于清代“新”边塞词的存在,清代边塞词在中国词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从词体的角度来看,也能说明词这种文体发展到清代,已经可以借用边塞题材来表达多样而复杂的思想情绪,这一点清词确实超越了宋词(只要将宋代边塞词和清代边塞词做对比即可印证)。这是词体自身的发展变化的结果,而各种“新”边塞词的出现,证明词这种文体有着不可限定的容纳空间。

[参 考 文 献]

- [1] 何尊沛. 试论清代边塞词[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 [2] 陶秋英. 中国妇女在文学上的兴趣[M]//张宏生,张雁. 古代女诗人研究.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 张宏生. 清代词学的建构[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 胡明. 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M]//张宏生,张雁. 古代女诗人研究.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5] 曼素恩.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 定宜庄,颜宜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6] 邬庆时. 屈大均年谱[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7]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顺康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8] 赵雪沛. 倦倚碧罗裙——明清女性词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9]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10] 吴藻. 香雪庐词[M]. 道光刊本.
- [11] 左锡璠. 碧梧红蕉馆词[M].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本.
- [12] 沈善宝. 名媛诗话(卷八)[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13]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刘尊明. 敦煌边塞词:唐五代的西部歌谣[J]. 文艺研究,2005(6).
- [15] 陈永正. 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 [16] 王夫之. 永历实录(卷一五《李来亨传》)[M]. 转引自王玉祥. 明朝简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 [17] 潘飞声. 论岭南词绝句二十首[M]//孙克强,等. 清人词话.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18] 张岂之. 中国历史·元明清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刘 英)